

十九世纪文学中的女性行为及其社会教育学方法

——以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为例

武拉·哈尔达基¹，卡特里娜·柯基-米塔蔻²

(1. 雅典国立大学，希腊；2. 亚里士多德大学，希腊)

[摘要] 考虑到女性的社会和教育准则——特别是那些地主阶级的女性——必须忍受的社会准则（包括他们的家人、朋友、无法拥有财产或爱上任何她们喜欢的人），显然在那个时代，做一个女性听起来更加复杂。诸如通过简·奥斯汀的文学作品，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女权主义暗示，这间接地让我们在社会和教育学领域中听到了女性的声音。

[关键词] 文学；十九世纪；女性行为；教育学方法；简·奥斯汀

[中图分类号] G 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9)02-0006-08

DOI:10.13749/j.cnki.cn62-1202/g4.2019.02.003

奥斯汀找到了一种以讽刺为武器的方式来表达她关于等级建设、职业的重要性（尽管对继承有共同的看法）、婚姻观和女性为找到真正幸福归宿而奋斗的世界观。尽管她在个人信仰上非常坚定——关注女性和她们对幸福的追求，但在她职业生涯的初期，相对于她的后期作品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不应看作奥斯汀变得更加保守了，虽然这是对她的第一部作品《傲慢与偏见》（1813）和最后一部作品《劝导》（1816）的第一印象。虽然乍一看，女主角们似乎是有区分的，抱有偏见、独立的伊丽莎白·班纳特似乎与更有说服力、更聪明的安妮·埃利奥特保持距离，很显然他们之间没有对话，但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她们都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站出来，为他们的社会和教育环境发声，为自己做决定，并且过的很幸福（尽管如此，这些都伴随着不同的步调和性格）。每一个人都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思想和行动路线，最终都指向同一个观点：他们在一个相当束缚的社会教育学环境中拥有选择的自由。

《傲慢与偏见》与《劝导》中的女权主义在社会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其他女性相比，伊丽莎白·班纳特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奥斯汀小说中是一个活泼叛逆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位活跃的思想家，摒弃了当时社会所特有的传统女

性社会教育的表现。这个特有的社会中，“除了结婚，女人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地位”（Handler and Segal, 694），如班纳特太太的女性人物认为婚姻是一种经销关系，为了他们家庭的存活，这种关系必须非常成功。正如奥斯汀本人在小说开头所强调的那样，“她生命中最重要事情就是让她的女儿结婚。”；作者讽刺性的话语间接地表现出对这种观念否定的态度。对这种信念，班纳特太太希望她的五个女儿都能成家立业——重点是要嫁得“好”——尤其是她的长女：简和伊丽莎白。按照当时的社会规范，女性不能继承财产（只有少数例外），因此，万一班纳特先生去世了，而他的女儿又没有嫁给拥有财产的男人，班纳特家就注定要陷入极度贫困和无家可归的境地。因此，对于班纳特太太而言，爱情绝对不是婚姻的先决条件，而是最后一件要考虑的事情，因为她和她的女儿都是生存在“在男权的摆布下”（Newman, 699），并被排除在男性独立的特权之外。伊丽莎白虽然不认同她母亲的想法，但是她也因自己在各种场合中（例如在尼日斐的舞会上），大声喧哗和不礼貌的行为而感到尴尬。

与班纳特太太的想法相同，卢卡斯太太和她的女儿夏洛特也都在寻找一种在经济上能保障他们未来的方法。后者的“目标”一直是结婚（Austen,

[收稿日期] 2019-02-15

[作者简介] 武拉·哈尔达基（Voula Hourdaki），希腊雅典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卡特里娜·柯基-米塔蔻（Katerina Kitsi-Mitakou），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

94), 和获得比她自己的家庭更大的财富; 这一目标是通过接受柯林斯先生向她的求婚来实现的——就在他被伊丽莎白拒绝之后。虽然男性认为他们的强大和自主权来源于他们的社会、教育和经济地位, 并且期望女性欣然接受他们的求婚 (Lowder Newton, 31), 但像伊丽莎白一样的女性证明了他们是错误的: 她不仅拒绝嫁给柯林斯先生, 而且表示如果婚姻没有相互的爱和理解, 那么对她来说, 财产、阶级或金钱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实是伊丽莎白坚持拒绝柯林斯先生——即使在他威胁她以后, 即使她知道可能再也不会再有类似的机会 (Austen, 83)——夏洛特则在他求婚后立即接受了他, 这导致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强烈的对比并且凸显出伊丽莎白自由和坚强的性格特点。

《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和她的姐妹们有所不同。更年轻的丽迪雅和凯蒂的特点是对婚姻的期望鲁莽且不成熟——前者与韦翰先生私奔, 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会使家族蒙羞。正如奥斯汀对丽迪雅的描述, “她的脑子里只有爱、调情和军官。” (214)。除了这一点, 当她终于嫁给韦翰 (因为达西先生的干预), 丽迪雅认为她的地位是令人羡慕的, 并坚信“已婚妇女从来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写信。但 (她的) 姐妹们可以写信给她, 毕竟他们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Austen, 251)。这一点足以由他们当时的社会教育环境和总体教育环境来解释。尽管伊丽莎白起初也对韦翰先生的魅力感到眼花缭乱, 但在小说的结尾, 当她发现关于他和达西先生的真相时, 她对韦翰的态度改变了, 她似乎已经吸取了教训: 第一印象可能是骗人的。而丽迪雅并没有从她的小“冒险”中学到任何东西, 继续以幼稚的方式行事。伊丽莎白似乎对丽迪雅、凯蒂和玛丽一点也不感兴趣, 因为她们似乎对每个人都漠不关心。不过, 她从妹妹简那里得到了一点安慰, 她们可以自由交谈。然而, 即使对于两人在善良和观念上相似, 简仅仅是“微笑”, 而伊丽莎白则是“大笑” (Austen, 293); 这表明伊丽莎白在很多场合都是自然的, 也很享受自己的笑容, 而简的微笑则是一种害羞调情和被动女性化的方式——在那个时期, 这是一种典型的礼貌得体的吸引男人注意的方法。并且, 伊丽莎白并不像简那样拥有浪漫的灵魂或爱做梦, 这也是为什么她和达西先生之间的爱情是渐进的, 而不像童话般的理由之一; 也不像简和彬格莱先生之间纯粹的浪漫的爱情。

至于小说中其他的女性人物, 伊丽莎白·班纳

特被塑造成一个非传统的形象, 卡罗琳·彬格莱小姐和德包尔夫人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他们所处的社会教育背景也是具有那个时代代表性的。彬格莱小姐是彬格莱先生的妹妹, 属于上流社会的上层阶级, 被描绘成一个相当势利的人物, 不但不断地评价伊丽莎白, 而且还不断地评价班纳特全家和他们的亲戚。根据奥斯汀的叙述, 彬格莱小姐认为班纳特小姐是一个“没有社交, 没有阶层, 没有品位, 没有美貌”的女人。总之, 对达西先生来说是个糟糕的配偶。她对伊丽莎白的态度, 一方面源自对她“美丽的眼睛”的嫉妒——达西先生这样称呼她; 另一方面源自她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丈夫的迫切心理 (社会强加给她的), 尽管鉴于她的阶层有钱可花, 就像 Judith Lowder Newton 的研究 (32)。把伊丽莎白的性格与凯瑟琳夫人的性格放在一起, 后者表现出粗鲁和虚荣, 对伊丽莎白有强烈的厌恶, 认为她“出身低微, 无足轻重” (Austen, 271), 在彭伯里大宅里没有立足之地, 并且认为她的存在“玷污”了彭伯里大宅 (273)。尽管凯瑟琳夫人出身高贵, 但她并不具有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女性的品质, 而是在小说中表现的相当的荒谬, 而伊丽莎白来自地主阶级, 则更具有尊严和优越感。她不容忍凯瑟琳夫人的侮辱性言论; 她是“绅士的女儿”, 因此, 与达西先生之间是“平等的” (Austen, 272); 在这一点上, 她的叛逆让她二人间谁的品质更加低劣一览无余, 这是与阶层和教育程度无关的。

《傲慢与偏见》的女权主义主要表现在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上, 这当然是革命性的, 但不能称之为激进。“狂放的”伊丽莎白与她的“凌乱的头发”, “肮脏的衬裙” (Austen 25, 26) 和发光的面颊, 反射出的并不是传统的顺从女性。她回应道, 她批判女性的态度和决定不仅从她自己的社会教育环境 (如夏洛特卢卡斯, 班纳特太太, 丽迪雅), 并且也从上层阶级 (如凯瑟琳夫人, 彬格莱小姐), 她认为他们是错误的, 并且毫不犹豫地批判男性的行为。即使她误判了外表——就像发生在韦翰先生和达西先生身上的事一样——应该强调的是: 她敢于批判, 而不怕受到惩罚, Lowder Newton 如是说。

为了让 19 世纪的女主人公摆脱批判和挑战——特别是关于男性的权力和女性的服从的问题——无论女主人公多么迷人, 无论她的反抗显得多么无力, 她仍然要反抗 (35), 这表明, 伊丽莎白在一个女性思想完全依赖男性的视角和认同的时

代，她正在进行一场个人的革命，无论这是多么渺小而无力。这对于当时的性别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随着事情的进一步明朗化，她实际上比她看起来更保守一点，与安妮·埃利奥特相比似乎不太时髦。

安妮·埃利奥特的性格与《劝导》中的其他女性形象不同，因为她“多情”和“坚强、坚韧的意志”（Walzer, 700）；这些品质可能会让人误认为她是“女性弱点的缩影”（701）；实际上她是最坚强的角色，如果联系到她与温特沃斯上尉分离时所承受的痛苦，以及她为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做出的牺牲。尽管她的父亲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认为她是“唯一的安妮”（Austen, 4），但她对她的父亲、家人和朋友都表现出无私的性格，她被看作不属于埃利奥特家族的人，因为她缺乏这个姓氏所带有的极度的自尊和势利。除了她的父亲，安妮的妹妹伊丽莎白和玛丽也被描绘成过于自负，心胸狭隘的人，因为她们更注重外在美和名望。例如，伊丽莎白差点就嫁给了埃利奥特先生——她的堂弟，他认为他“是她父亲的继承人”（Austen, 7），而因为玛丽“有太多埃利奥特家族的骄傲”（93）则嫁给了查尔斯·穆斯格罗夫——安妮拒绝了他，类似于伊丽莎白·班纳特拒绝了柯林斯——作为维护她的社会（家庭教育和文化）地位的安全保障。奥斯汀又一次以喜剧的方式描述上层阶级，因为埃利奥特夫妇不得不出租他们的庄园，凯林奇庄园，搬到巴斯，这显然构成了强烈的讽刺意味：“代表稳定的秩序被……摒弃了”（Duffy, 282）并且从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来说，不同社会群体都有令人钦佩的特征，而且通常不存在于颓废的贵族阶层中（这里不包括安妮）。虽然安妮不否认她的阶级，但她不喜欢它对人的自我的影响。相反，她“欢迎她家那些快乐的入侵者”（Duffy, 283），同时她钦佩并欣赏海军阶层；而这正是她与家人疏远的原因。《劝导》的女主人公作为一个谦虚和成熟的具有良好文化和教育范式的女人而著名，这朝着女权主义迈出了一步，尽管她年轻时曾被拉塞尔夫人说服，解除了与温特沃斯上尉的婚约——一个她希望嫁给他的男人。安妮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让别人引导了她，她“谴责拉塞尔夫人的建议，但她不谴责她本人”（Fairchild Brodie, 715）；她不断增长的年纪和经历都让她认识到，她从前对别人意见的顺从是自己犯的错误的。此外，她还决定追随拉塞尔夫人和史密斯夫人在“寡妇的社会角色”（Fairchild

Brodie, 711）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样，拒绝那些将会妨碍她保持独身的求婚。她不愿因为利益而嫁给一个男人——就像克莱夫人渴望嫁给沃尔特爵士一样——而是选择在年龄和无子女的压力下继续未婚生活（Myers, 228）。她也喜欢和像史密斯夫人那样有内涵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和像达尔林普尔夫人和卡特莱特小姐那样物质的人在一起；这让她的父亲十分恼火，他认为“所有让人反感的東西，卑鄙的同伴，肮脏的房间，污浊的空气，令人厌恶的联想都在吸引着她”（Myers, 166）。这种选择表达了另一种家庭精神和教育成长的精神。除此以外，安妮还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女主人公——小说中的其他任何角色都不具备这种品质——无论是陪伴史密斯夫人还是照料玛丽生病的孩子，甚至在路易莎马斯特洛跌倒后还走上前帮她（虽然路易莎疯狂地爱上了安妮喜欢的人，温特沃斯上校）。相比之下，路易莎是一个不成熟的年轻女人，她不怕向温特沃斯展露她的美貌，而安妮已经不再是如花的年纪，但是她有人格美和教育美，这使她坦然面对并毫不张扬自己对温特沃斯的愛，直到最后。

《劝导》的女权主义在广泛的家庭和社会教育背景中都被忽视了，因为它的主题是：说服和被说服的行为。然而，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女主角在发现自己的错误——关于过去的决定和选择——意识到并接受它们的优点。安妮·埃利奥特并不软弱，因为有人曾建议她不要嫁给温特沃斯上校：“（她）在订婚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应该比她放弃这件事所遭受的还要多，因为（她）的良心遭受了更多的痛苦”，正如她自己所说（Austen, 264）。她很坚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他的爱，这种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当她再次见到他的那一刻，她就意识到了。事实上，他对他的感情仍然很稳定，相信他还是曾经的那个温特沃斯上校，没有什么钱（尽管这些年来他变得富有了），这表明阶级、物质价值或职业对她而言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安妮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个方面，她的叛逆不仅表现在把海军军官们看作“平等……和其他人一样”（Austen, 18），而且表现在喜欢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她认为这是一种构成了“进入一个崭新而令人兴奋的世界的运动，即实施者和制造者”的职业（Shaw, 299）。她不在乎一个男人是否继承了财富或者赚到了财富；她似乎对属于后一类人更尊重——即使对于要走进婚姻殿堂的女性来说包含“危险”而不是“安全与寻常”（Shaw, 301）。

综上所述,人们会认为伊丽莎白·班奈特和安妮·埃利奥特之间没有真正的相似之处;前者表现得更为直率和富有表现力,而后者似乎更脆弱——在和伊丽莎白一样的年纪——但在她28岁时,她的观点则“沉默”。然而,这两个女主人公的共同点比预期的要多:缺乏合适的母性形象;几乎都出现了“三角恋爱”和拒绝求婚;下层阶层的人所提供的重要信息,对女主人公的幸福有重要影响;而男主人公在特定时期的缺席对女主人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很容易在这两个故事中找到,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关于母性的概念或者说缺少母性,这与伊丽莎白和安妮的性格有很多联系。奥斯汀不仅把班纳特太太当作一个无知的例子,更是一个糟糕的母亲,绝对不是女儿们的榜样,尤其是伊丽莎白,她想在她姨妈嘉丁纳太太身上寻找母亲的影子;是嘉丁纳太太把她带到彭伯里山庄去的。在那里她通过女房东了解到了达西先生真实的性格,并意识到她对他的爱(Myers, 228)。伊丽莎白和她的母亲一点也不亲近,事实上,她不认同她母亲的性格也不听从她的建议,而她的父亲则是她愿意信任并听从的人。鉴于那个年代家庭的社会和教育情形,父母的关系也可以作为证明当时家庭价值关系的一个例子。班纳特先生和简以及嘉丁纳太太构成了伊丽莎白所喜爱和欣赏的真正的家庭成员。她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决定,从不依靠母亲;对伊丽莎白来说,班纳特太太作为一个母亲的存在感很弱,也不是一个值得她尊敬的女人。这就是她想要避免“她父母的婚姻模式”的充分理由(Myers, 228)。这种出于利益而产生的婚姻并没有吸引伊丽莎白,她正在寻找的丈夫是一个有更多共同点的人。另一方面,安妮的母亲埃利奥特夫人去世了,拉塞尔夫人曾试图填补她的空缺,虽然差一点成功,但因为“(她的)养母身份给她带来了细微的精神刺痛,本来是想保护她的,却破坏了安妮的幸福。”(Myers, 231)。尽管拉塞尔夫人很关心安妮,但她误判了人(温特沃斯上校和埃利奥特先生),给了安妮错误的建议,如果不是安妮具有自由的意志和批判性的思维,她的幸福将被毁掉。与伊丽莎白相比,安妮的处境更糟,因为她在亲戚中找不到安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拉塞尔夫人的爱和史密斯小姐的出现使她得到了安慰。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两位女主人公都深受家庭对她们的轻视,并且都有要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的压力——安妮这个角

色在她们两人中显得更加“饱受折磨”。

将两位女主角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纽带是三角的恋爱关系,以及拒绝求婚。正如 Thomas P. Wolfe 所观察到的,“安妮—温特沃斯—埃利奥特的关系类似于伊丽莎白—达西—韦翰三人的关系……在每部小说中,女主角面对两个非常吸引人的追求者,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埃利奥特先生的出现对安妮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刻,因为她在再次见到温特沃斯上校后不久遇到了他——她宁愿对和他的相遇是波澜不惊的。起初,他对她的表妹表现出尊重并珍视——但为温特沃斯已看透了真相并且间接地表示了他的嫉妒——但事实上,他有兴趣的是成为凯林奇庄园的继承人(这也是他为什么试图勾引克莱太太并且阻止她嫁给沃尔特爵士,因为这样她就有可能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了)。虽然每个人都喜欢这个邪恶的角色,安妮想到“成为她母亲曾经的样子;拥有‘埃利奥特夫人’这个高贵的名字……回到凯林奇庄园,还把那里当作家……”(Austen 169)如果她嫁给他,她足够聪明能在史密斯小姐那里听到真相之前就辨认出他的虚假性格。正如奥斯汀所说,“她的判断……是不利于埃利奥特先生的。”(169),她不会被外表或赞美所愚弄:她相信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教育思维有助于她正确地诠释语言和行为。《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三角关系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结合受到有魅力的威克汉姆先生的威胁,威克汉姆先生不仅使她十分喜欢他,而且歪曲了关于他与达西过去的真相,把达西先生说成一个没有良心的势利小人。伊丽莎白比安妮更年轻,更容易受到教育和第一印象的影响,她被困在自己对达西的偏见和韦翰的谎言之间,所有的一切她都导致了她愤怒地拒绝达西第一次向她求婚。她没有足够的经验来质疑韦翰先生的说法,所以盲目地相信他,直到她发现谁才是真正的坏蛋——无论是从达西先生那里还是从韦翰与丽迪雅私奔这件事。她意识到,“(她)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无知愚昧让她与理智背道而驰。在此之前,她从未了解过真正的自己。”(Austen, 159)。很明显,伊丽莎白在小说的结尾经历了一个成长和教育成熟的过程,这是安妮在前期就经历过的。由于缺乏经验,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就没有看清韦翰先生的真面目。Susan C. Greenfield 非常恰当地强调说:“伊丽莎白最严重的错误是她把语言过于字面化——认为文字就是真相。”(343),就像韦翰对达西人品的描述一样,伊丽莎白甚至没有要求

他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些指控。此外，关于拒绝求婚的问题，两位女主人公都拒绝了适合她们社会和教育地位但不适合她们感情状态的婚约：正如前面提到的，伊丽莎白拒绝了柯林斯先生，安妮拒绝了穆斯格罗夫先生，尽管他们的经济条件是两个家庭都要的。奥斯汀一直把无畏和勇气寄托在她的女主人公身上，鉴于她们的个人信仰和目标，她们不会拼命抓住这个机会的——安妮再一次代表了“勇敢者”，不像年轻的伊丽莎白，她的年龄基本不可能再找到一个丈夫了。

此外，毫无疑问，《傲慢与偏见》和《劝导》中的女主人公之间有一个非常相似之处，那就是她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从那些在社会教育地位上比自己低的人那里得到过帮助。尽管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的叔叔和婶婶住在伦敦齐普赛街附近，靠做生意赚钱（因此被认为是低人一头的），但嘉丁纳夫妇在女主角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推动了小说情节：他们带她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彭伯利庄园，在这样做的时候，“她觉得，这个可能是情妇会干的事！”（Austen, 185）。如果不是他们坚持要看达西先生的家产，伊丽莎白就永远没有机会见到雷诺太太了，她是一位“样貌可敬”的管家（Austen, 185），班纳特小姐从她那里得知了真实的达西：“最好的地主，最好的主人。”（Austen, 188）。在安妮·埃利奥特的例子中，史密斯太太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因为她告诉了女主角埃利奥特先生是个“冷血动物”（Austen, 212）以及他对她和她家庭的真实意图的人。尽管她是个寡妇，过着“非常卑微的生活……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之外”（Austen, 161），史密斯太太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揭露了安妮表弟的过去（他与前妻结婚是因为贪财）并帮助她最终作出不结婚的决定。奥斯汀小心翼翼地选择了这些特殊的人物——从嘉丁纳夫妇和雷诺兹太太一直到史密斯太太——来启发女主人公的本性，或者帮助他们与爱的人结合起来，以便表明阶层和美德是没有关系的。

谈到男主角的缺席及其对女主人公感情的影响，伊丽莎白和安妮显然都认识到她们分别在达西先生和温特沃斯上尉缺席期间对他们的爱——不管这种缺席是几周还是几年。在《傲慢与偏见》一书的开头，当伊丽莎白认识达西时，她误解了他，并且对他的性格作出了错误的推论；正是他的缺席让她“丰富了智慧，并成长了许多”（Greenfield, 338），让她明白他并不是一个自负的人，而是一个

正直和慷慨的人。更有甚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伊丽莎白到彭伯利庄园发现自己非常想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即使她深知房子的主人并不在这里。正如 Greenfield 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伊丽莎白）当他不在时才发现对他的需要”（346），在某种意义上，当她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无法清晰地思考，也许是由于她对自己的感觉感到困惑。如果他不在她身边，看她或和她说话，她就能不受他的干扰，更容易辨别自己思想和情绪。虽然在《劝导》中，安妮并没有对温特沃斯改变心意，而是从一开始就爱上了他，但是可以把伊丽莎白与她心爱的人缺席联系起来。正如埃利奥特小姐自己在与哈维尔上尉谈话时所说，“（她）的性别所需要的特权……爱是长久的，不论希望的存在或消失”（Austen, 252）。如果考虑到安妮对温特沃斯长达八年半的感情和半年分离以及她对查尔斯·穆斯格罗夫的拒绝，事情就不难理解了。她不知道自己最终是会嫁给别人，还是会再见到她爱的人，尽管如此，她也不害怕无条件地继续爱着温特沃斯，她的感情随着时间变得更加强烈。

尽管奥斯汀的两位女主人公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个人的、社会的、教育的、文化的，但不可否认，通过两位女主人公的女权主义倾向也强烈暗示了作者个人的进步。在她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这些倾向不仅通过广泛使用清晰的女性观点来证明，而且通过更现代的观点来证明。这两种因素，再加上作者对故事结尾的态度的转变，导致了以下结论：奥斯汀已经从对女性思想和行为的保守立场转向了更为开放的立场——这一点将在后面得到进一步理解。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通过伊丽莎白·班纳特，使读者对女性内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摄政时期的女性都在思考、感受或谈论什么。这是通过部分使用伊丽莎白的意识流来实现的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诚地感觉到她可以爱他，其他的爱都是苍白的”（Austen, 210）或“她现在开始明白，他就是那个男人，在性情和才能各方面最适合她的”（Austen, 237）。相比《劝导》的叙事手法，“小说的大部分情节都是通过安妮的意识来调节的”（Wolfe, 687），《傲慢与偏见》也提供了其他角色的观点，并且没有只关注主角的声音——这也揭示了奥斯汀的写作技巧以及她对“曝光”女性思想的态度已经进步了，因为她在《劝

导》中大多数用女性语调来表达自己的对阶级问题以及总体社会和教育问题的看法（例如，透过安妮的眼睛，读者可以看到，沃尔特爵士比凯瑟琳夫人更滑稽，更愚蠢，尽管他是一个准男爵。）

十九世纪女性行为： 总体社会教育学评论

19 世纪女性的主题在文学领域被认为是一个雷区，因为“对女性的去性别化，是通过重新定义她们为母性而非有性别的生物来实现的”（Ruth Perry 213），当时许多作家在作品中都忠实地遵循了这一理念。在这个特定时代，习俗强化了“家庭妇女”的刻板印象，她们在生活中的主要角色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主妇和一个优秀的母亲。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社会教育学观察可以由此得出。这种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被过分地表现出来，目的不仅是为了劝阻妇女不要想离开家庭，而且强调决不参与家庭事务的男性所扮演的相反的角色。考虑到这一切，奥斯汀把她的角色置于更为女性主义的立场，无论是在《傲慢和偏见》中，她经常使用不同的脸红来形容角色（Mary Ann O'Farrell, 128），还是在《劝导》中，“奥斯汀鼓励安妮盯着温特沃斯上校的身影让这段感情充满激情”（Jill Heydt Stevenson, 338）。鉴于前面第一部分的理解，脸红作为一种活动，在性别的框架中，等同于能量、隐藏的情绪或尴尬：正如 O'Farrell 所强调的，脸红是背叛的一种（128），在某种意义上，隐藏的感觉可能会在看到想要的对象时不由自主地浮现；伊丽莎白·班纳特在靠近达西先生时，双颊泛起“最深的红晕”（Austen, 190）。在第二部分中，虽然《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人公的脸红并不被社会上和教育上认可，但奥斯汀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改革，她通过让安妮·埃利奥特巧妙地用身体行为而不是激烈的言语交流与温特沃斯上校调情——像伊丽莎白一样。《劝导》的主人公更频繁地脸红，叹气，总是喜欢的盯着温特沃斯的身影，体验“她羞于探究的感觉”（奥斯汀，178），这同时也启发了沉默的她的自由的一面。奥斯汀笔下的安妮和温特沃斯并没有言语上的冲突，这暗示着激情（伊丽莎白一达西），而是长时间地相互注视，甚至轻微地抚摸，这使他们之间充满“压抑的欲望”（Judy van Sickle Johnson, 46）和未说出口的承诺。伊丽莎白和安妮在公共场合都有过无声的高潮（人们认为脸红表明了这一事实），而前者是两人中更为

现代的，因为她主动向上尉求爱。

简·奥斯汀在她的最后一部小说中比以往任何一部作品，包括《傲慢与偏见》都更能证明她的原始女权主义者特点。而在后者中，最终，伊丽莎白·班纳特的财政和阶级得到了保证，《劝说》则以一种“苦乐参半”的口吻结束，为女主人公提供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Fairchild Bro., 716, 698）。进入海军圈子后，安妮·埃利奥特将她自己置身于接受一个全新的阶层作为她自己阶层的冒险中，除此以外，还要在有战争时和丈夫长期分离。与伊丽莎白稳稳地嫁给了小说中最英俊、最有钱的人物相比，安妮选择了带着希望走向未来，尽管她也不知道是否最终会带来幸福。然而，尽管最终归为自由主义者（因为女主角决心放弃作情凯林奇庄园主人情人的梦想，为了确保得到的是爱，而不只是社会地位），奥斯汀被她所在的社会和教育所限制，对海军这一职业的认识是“比起对国家的重要性，它的内在美德更让人尊敬”（271）。无论贵族阶层隐藏了多少腐败和堕落，简·奥斯汀都无法废除其对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维护，只能间接地展示她对它的批判。

教育与社会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分析性评论往往侧重于妇女为促进她们的要求而使用的方法，同时通过不“威胁”男子或家庭单位来保持她们的思想和女性的吸引力之间的微妙平衡（Weeks, 2011）。

19 世纪女性文学中关于女性与教育、工作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从男性统治和压迫女性理论中产生的后果的理论和实证争论，仍然是 21 世纪的女性和性别研究领域研究的重要来源，以及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并且对哲学中的认识论、形而上学、政治理论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其他科学也有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女权主义文学，我们引入新的观念和观点，这些观念和观点已经改变了教育和社会本身。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也提供了很高的教育价值，如团体、阶级和工作、残疾、家庭、再生产、自我和性别。同时，它给学校制度、科学、全球化、人权、大众文化、种族和种族主义带来了特别女性化的视野（Enns Ada, 2005）。

在以上背景下，女性主义教育学被认为是一种思考教学和学习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规定性的方法。因此，它在不同学科用不同的方法区分不同的

目的,如文学和学习环境(家庭、社会等。这个框架还可以解释不同时期(如19世纪的女性)和不同领域(如文学领域)的女性的行为(Enns Ada 2005)。

女权主义教育学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在社会和教育学解释的一些关键轴心上存在共识:第一轴心涉及男女之间的等级制度问题、家庭及其大环境的影响;第二轴心是利用经验和日常生活活动以及社会教育影响和学习的问题,以及第三轴心与学习与教育问题有关,它是连接到个人的家庭地位和关系和与所有相关的教育和教育成果以及广泛的社会经验(Sandberg 2013)。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必须强调,19世纪的性别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男性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父权制模式,二是坚定而渐进的女性向对她们的排斥发起挑战的过程。

因此,在19世纪的社会和文学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地位的社会变革,在家庭生活和道德方面也起到了促进性别意识和改革的作用,因为分配给女性的角色越来越与社会和教育现实不一致。此外,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等作家表达并影响了这个时代对女性的期望。通过他们的小说和许多其他19世纪的女性,描绘了她们的社会和教育强加给她们的往往相互矛盾的期望。因此,这些女性与其他人一起,表达了情感、想法、价值观和信仰,以支持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Hooks 2000)。

综上所述,通过对两位女主人公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们都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典型女性,各有其独特之处在家庭、教育和文化方面。安妮和伊丽莎白被描述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彼此完善,都具有对方“缺乏”的品质。即使这些主人公没有得到他们自己家庭或小说其他角色的充分赏识,奥斯汀也证明了

“年轻女性的价值,在最后几幕中,达西对伊丽莎白说:“我不欠你什么!你给我上了一课,一开始的确很难,但非常有用……我闭上眼睛,听不懂你说的话,也不懂你的想法。”(Myers 232)。通过这些话语,女性精神被男主人公所重视,在故事的最后,女主人公选择了自己的命中注定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方法选择丈夫。正如Newman所支持的那样,奥斯汀应该被形容成一个革命者,因为她的女主人公没有被表现成“没有被社会强加给他们的权利所限制”(706),但似乎与摄政时期刻板的被动女性相反;她们积极地为自己的生活和幸福做出决定。然而,奥斯汀把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放在一个更便捷的地位嫁给了达西,在她的写作生涯开始时显得有些保守:她提出了对钱或房产是否可以带来给女人带来快乐的质疑,答案是没有,但是最后她的女主人公却安全的住再彭伯里庄园里。因此,如果《劝导》被考虑在内,简·奥斯汀的个人和教育信念真正发生变化在:安妮不怕尝试与温特沃斯上尉一起过“永远幸福”的生活,温特沃斯上尉的职业使他看起来比当时的贵族低人一等,而且几乎不是个绅士,但他的善良和爱她的心赢得了安妮。奥斯汀在她过去的作品中,通过结合安妮和温特沃斯的例子,在捍卫自己关于金钱和地位的观点方面变得更加坚定,并且没有忘记社会界限不允许她充分的表达她的思想。毫无疑问,她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从“更安全的”(傲慢与偏见)走向“更危险的”(劝导)——这在当时是看不见的,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并且没有任何激进主义色彩。综上所述,家庭中男女主人公、教育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真实地描述了家庭、教育、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关系、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性别问题、情感等),文学作品同时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种知识和满足。(Lundberg A. & Ann Werner, 2013)

[参考文献]

Austen, Jane. 《Persuasion》. New York: Bantam Dell, 2008. Print.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rint.

Duffy, Joseph M., Jr. “Structure and Idea in Jane Austen’s ‘《Persuasio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8. 4 (1954): 272–289. JSTOR. Web. 1 April 2013.

Enns, Carolyn Zerbe and Ada, Sinacore (2005). *Teaching and Social Justice: Integrating Multicultural and*

Feminist Theories in the Classroo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Fairchild Brodie, Laura. “Society and the Superfluous Female: Jane Austen’s Treatment of Widowhood.”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34. 4 (1994): 697–718. JSTOR. Web. 1 April 2013.

Greenfield, Susan C. “The Absent-Minded Heroine: Or, Elizabeth Bennet has a Thought.”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9. 3 (2006): 337–350. JSTOR. Web. 23 April

2013.

Handler, Richard and Segal, Daniel A. "Hierarchies of Choic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nk in Jane Austen." *American Ethnologist* 12. 4 (1985): 691 — 706. JSTOR. Web. 1 April 2013.

Heydt-Stevenson, Jill. " 'Slipping into the Ha-Ha': Bawdy Humor and Body Politics in Jane Austen's Novels."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55. 3 (2000): 309 — 339. JSTOR. Web. 1 April 2013.

Hooks, Bell (2000).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 New York: South End.

Johnson, Judith Van Sickle. "The Bodily Frame: Learning Romance in *Persuasio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38. 1 (1983): 43 — 61. JSTOR. Web. 1 April 2013.

Lowder Newton, Judith. " 'Pride and Prejudice': Power, Fantasy, and Subversion in Jane Austen." *Feminist Studies* 4. 1 (1978): 27—42. JSTOR. Web. 1 April 2013.

Lundberg A. & Ann Werner (eds), *Gender Studies Education and Pedagogy*, Swedish Secretariat for Gender Research, Gothenburg Sweden, 2013.

Myers, Sylvia H. "Womanhood in Jane Austen's Novels."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3. 3 (1970): 225

—232. JSTOR. Web. 1 April 2013.

Newman, Karen. "Can This Marriage Be Saved? Jane Austen Makes Sense of an Ending." *ELH* 50. 4 (1983): 693—710. JSTOR. Web. 1 April 2013.

O'Farrell, Mary Ann. "Austen's Blush."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27. 2 (1994): 125—139. JSTOR. Web. 1 April 2013.

Perry, Ruth. "Colonizing the Breast: Sexuality and Matern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 2 (1991): 204 — 234. JSTOR. Web. 23 April 2013.

Shaw, Valerie. "Jane Austen's Subdued Heroine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30. 3 (1975): 281 — 303. JSTOR. Web. 1 April 2013.

Walzer, Arthur E. "Rhetoric and Gender in Jane Austen's *Persuasion*." *College English* 57. 6 (1995): 688 —707. JSTOR. Web. 1 April 2013.

Weeks, Kathi (2011).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ar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olfe, Thomas P. "The Achievement of *Persuasio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1. 4 (1971): 687—700. JSTOR. Web. 1 April 2013.

Female Behavio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Works and the Social Pedagogical Method: Taking British Novelist Jane Austen as an Example

Voula Hourdaki¹, Katerina Kitsi-Mitakou²

(1.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thens, Greece; 2. Aristotle University, Greece)

[Abstract] Women in Regency era were subjected to the complete obedience to patriarchal society, with no freedom to express personal ideas. Given the social and pedagogical rules that women, especially those from landlord class, had to obey (they were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property or the freedom to love whom they loved), being a woman in that era apparently could be much more complicated. Signs of feminism can be easily detected in Jane Austen's literature works, making the voice of women heard in our social and pedagogical fields.

[Key words] literature; nineteenth century; female behavior; pedagogical method; Jane Austen

(责任编辑 王鉴/校对 王明娣)